

词汇学问题

周 荐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PDG

序

收入这本集子中的大大小小二十余篇文章，是从近三五年来所发表的语言学论文中选出来的。它们论题比较集中，所谈的都是词汇学的问题，或者是与词汇学关系密切的一些问题。1995年以前发表的词汇学论文，大多已收入1994年出版的《词语的意义和结构》那本集子中。和第一部论文集一样，收入这部书中的文章除个别失校之处和不太适宜的例子作了必要的更动外，其它都一仍其旧，以使读者看到我所走过的路。个别论文中的观点或有不太一致之处，说明我对那些问题的思考的加深，这里也不予更改，以尽量保持文章的原貌。

自从1983年发表第一篇语言学论文，我已在语言研究的道路上走过了15年的历程。虽然已先后发表语言学论文50余篇，独自或与其他学者合作撰写出版语言学专书7部，但这些论著有不少都卑之无甚高论，只有一些还多少闪现出一点儿思想的火花，因而得到了语言学界一些前辈学者和同道的肯定。每隔几年把自己零散发表在一些期刊上的论文结集出版，一是想向关心我的前辈们、师长们交一份作业，以使他们看到我这些年来成长的情况，从而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指导和教诲；二是想给自己留下一份成长的记录，以砥砺自己，快一点进步，真正成熟起来。

在这部论文集即将付梓的时候，我要向多年以来培育我成长、关心我进步的校内外的先生们、老师们致以深深的谢意。校内的如邢公畹先生、刘叔新先生、宋玉柱先生、解惠全先生、马庆株先生，校外的如张清常先生、李行健先生、符淮青先生、

温端政先生、张志毅先生。正是有这么多学者的提携和帮助，我才在语言研究的道路上走下来了，尽管我所走过的路并非笔直平坦的，脚步也是蹒跚踟蹰的。

已经过去的 1997 年，是我的“不惑之年”。然而，要想在学术研究上真正“不惑”，对我这样资质驽钝的人来说，是万难做到的，也许我得毫不懈怠地奋斗一生才有可能接近这个目标。我想，只要我认真、努力去做了，到我垂暮之年，不论“惑”与“不惑”，我都将会感到此生无憾，没有虚度。借用王安石的话说，就是“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

周 荐

戊寅年夏月新雨霁日

记于南开园北村寓所

目 录

序

近二十年来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概说.....	(1)
异名同实词语研究.....	(14)
同名异实词说略.....	(24)
同义词语聚合应否语法属性一致.....	(35)
词语表达色彩的性质和显映方式.....	(53)
论词语的时代色彩.....	(68)
熟语分类问题研究.....	(80)
论四字语和三字语.....	(106)
三字格结构分析.....	(117)
论成语的经典性.....	(127)
成语问题四论.....	(146)
惯用语新论.....	(159)
成语规范问题谈略.....	(173)
论异形词的确定和规范.....	(183)
从高丽语 (Korean) 由汉语借入的成分	
谈外来成分的某些性质和特点.....	(200)
拟外来词——文化交流中的怪胎.....	(214)
词的意义的分类和词典的编纂.....	(218)
词典释义、出处溯源和引例借鉴与抄袭的分野刍议.....	(226)

现代汉语研究综述·词汇部分(1992)	(234)
现代汉语研究综述·词汇部分(1993)	(242)
《语文学习新论》读后	(249)
《汉语惯用语大辞典》序	(261)

近二十年来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概说

内容提要 现代汉语词汇学自 20 世纪初产生以来已有了近百年的历史。纵观这百年历史，可以很清楚地看出，20 世纪的上半叶（1950 年之前），现代汉语词汇学尚处于萌芽草创期，在那一时期，词汇研究还没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对象也还不十分明确，对问题的认识非常肤浅；20 世纪中叶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里（1950 年-1978 年），现代汉语词汇学虽已处于蓬勃发展期，但在理论方法上多蹈袭前人和西人，研究对象仍不算广泛，也少有深刻的论著出现；20 世纪下半叶的二十年左右的时间（1978 年-今），算得上是现代汉语词汇学的成熟期，在这一时期，词汇研究有了自己较为完备的理论方法，研究对象已十分广泛，对一些问题的研究也已相当深入。本文的写作目的，就是要把近二十年来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情况，按词的结构组织、词构（词的结构）、词的表达色彩以及从经典性的角度对熟语所作的分类等几个方面，进行一个较为系统的总结和介绍，期使学界对现代汉语词汇研究近二十年来的发展和所取得的成果有一个较为清楚的了解。

关键词：汉语词汇 结构组织 词构 表达色彩 经典性

近二十年来在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中取得了不少可贵的创获，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就是对词的结构组织的挖掘。所

谓结构组织，是指词在意义上因与另外的词有某种内在的关联而形成的一种组织体。“不同的词语单位之间，如若存在相互制约、对立或相互依赖、对比、因应的内在关系，就形成一种结构。这些相应的单位集结而成的整个组织体，就是结构组织。”[1]对词的结构组织的研究由来已久，在 20 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即已有多家关于同义词的观点出现。[2]但不可否认的是，20 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前的结构组织的研究并未取得骄人的成就，原因主要有如下两点：第一，绝大多数学者所研究的结构组织仅是同义词、反义词等有限的几种；第二，研究方法多借鉴白俄苏，不但显得较为陈旧，而且未必完全符合汉语的实际。对词的结构组织较系统的研究，发轫于 20 世纪六十年代上半叶，[3]但对其进行更全面地研究，而且以其成果作更富理论意义的阐述，却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从事词的结构组织研究的学者有很多，其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是南开大学的刘叔新教授。刘叔新在 1964 年即已指出，语言词汇中存在着同义关系（如“顺利”和“顺遂”）、反义关系（如“美”和“丑”）、分割对象关系（如大学教师这一对象就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所分割）、特定搭配关系（如“白色”在与“政权”“恐怖”等相搭配时，只能是反革命的意思，而绝不表示颜色）和词族关系（如“口”“口腔”“口头”“口语”“口试”“口水”……）。[4]1990 年，刘叔新又在此基础上指出，语言词汇中还存在着另几种结构组织，那就是对比关系（如“民主”和“集中”）、固定搭配关系（如“文质”和“彬彬”固定搭配）、单向依赖关系（如“嫂子”依赖于“哥哥”而存在）、互向依赖关系（如“武器”和“杀伤力”相互依存）、挨连关系（如“春”“夏”“秋”“冬”挨连在一起）、级次关系（如“总行”“分行”“支行”一级低于一级）。[5]先后挖掘出来的词的结构组织一共有 11 种之多，刘叔新用这 11 种结构组织

的总和证明了词汇体系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因为语言词汇里的任何一个单位都将一无遗漏地被网罗在这个结构组织的总和之中。在这一分析过程中，充分展示了汉语词汇结构组织的丰富性和某些结构组织的独特性（如特定搭配关系、固定搭配关系、单向依赖关系），这无疑使汉语词汇学理论得到了丰富。

对汉语词的结构组织的挖掘，是现代汉语词汇学中带有突破意义的研究课题。这一研究课题的解决，表明学者们不再把词汇看作是一个松散的集合，而将其视为一个结构体。当然，虽然我们已从汉语词汇中挖掘出了 11 种结构组织，但实际上并不是这 11 种结构组织挖掘的深浅程度都完全一样。我们得承认，只有有限的几种结构组织得到了较为深入的挖掘，如同义关系、反义关系，多数结构组织的研究目前还处于摸索阶段。即使是同义关系、反义关系，也只是在某些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开掘，[6]更全面的研究还只能待之来日。[7]

二

现代汉语词汇学近 20 年来的另一个重要创获，就是对词的结构的研究。

汉语词的结构，19 世纪末就有学者进行了分析；[8]进入 20 世纪以来，复有吕叔湘、王力、高名凯三氏作了进一步的研究。[9]但是，上述学者，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一大批学者，一般都将词的结构方式和短语的结构方式看作是一回事。词的结构，简称作词构，它指的是词内语素与语素的结合。词的结构方式，就是词内语素与语素的结合方式。语素在性质、功用等方面都与词有着不小的差异，把词内语素与语素的结合方式比附于短语内词与词的结合方式，显然是不合适的。这一点，早在 1957

年就已有学者撰文指出。[10]不纯粹按照短语内词与词的结构方式对词内语素与语素的结构方式进行分析的学者，无论是20世纪中叶还是更早的上半叶，都有人在——二十年代是黎锦熙，五十年代是崔复爱。[11]但是，黎锦熙也好，崔复爱也好，他们虽提出了在他们那个时代难得提出的见解，由于历史的局限，其所提出的观点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难与晚近以来一些学者的观点同日而语。八九十年代有数位学者对词的结构方式提出了新的认识，作出了新的分析。

对词的结构方式提出新的认识的学者主要有丁全、戴昭铭、刘叔新、周荐。丁全指出，传统上把复合词分作联合式、偏正式、述宾式、补充式、主谓式，“这是根据词根之间的语法关系划分的，是用句法的模式去套词法”，认为“词的构成自有它自身的规律”；[12]戴昭铭指出，词内语素的语法性质和语素间的结构关系并不存在着整齐的对对应关系，结论道：“词法结构和句法结构的不完全对应是具有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的根源在于词具有区别于词组和句子的本质特征。”[13]刘叔新认为，复合词结构无论其词素的顺序形式还是意义关系，都无句法性质，也非词法现象，而只是词汇性的，提出：“复合词内的词素，既不可能有词的形态变化等词法特点，又由于并非意义明晰地、独立地与相邻词素组合，并且不能单独与其他成分组合，也没有句法方面的功能特点。复合词的词素不是由语法特点所决定的一定词类的词，而且本身根本不可能有语法的类别。”[14]周荐认为，传统上所说的复合词的六种格式实际上不能把所有的复合词概括净尽，不少词无法纳入既有的框框，主张“不泥于六种格式的定说，而按照词素所以组合成词的实际情况对复合词内部的意义关系加以分类”。[15]周荐在另一篇论文中，一方面全面考察了受句法结构模式影响的31237个复合词的情况，指出：“汉语复合词在由人们用语素和语素结

构成的时候，首先被考虑的是，所选择的两个语素有无像两个词一样搭配在一起的可能。如果所选择的两个语素有可能组合在一起，那就具备了构成复合词的最基本的条件；如果所选择的两个语素没有可能组合在一起，那就较难结构成复合词。复合词的语素和语素能/不能搭配，是深受句法结构规律的模式影响的。”另一方面又对不能或难以用句法的结构模式加以解释的 1109 个复合词作了分析，指出那些“词中语素与语素的结合，说明了汉语复合词结构类型的复杂性，也表明了完全用句子中词与词（或词与词组，词组与词组）的结构模式来解释复合词中词根与词根之间的结构关系的困难”。[16]

对词的结构方式进行分类研究的学者也有一些，其中周荐对现代汉语中的全部的双音节复合词所进行的穷尽式的分类研究，引人注目。该研究分如下几步进行：第一步，从《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1978）中所收的 56000 余个条目中甄选出全部的双音节复合词，计有 32346 个。第二步，把受句法模式影响的词分别归入相应的类中，把不能或无法用句法模式解释的词归入“其它”类中，这样就为复合词分出定中格（如“水球”“鸟枪”）、状中格（如“路祭”“函购”）、支配格（如“怀古”“媾和”）、递续格（如“拔取”“请教”）、补充格（如“处死”“荡平”）、陈述格（如“肠断”“官司”）、重叠格（如“伯伯”“寥寥”）、并列格（如“原委”“牙齿”）、其它（如“弱冠”“雷同”）等 9 大类。第三步，根据语素本身的性质特点对所分出的 9 个一级类复合词进行二级分类，得出 30 个二级类，例如定中格就再分为 $n+x$ 类（如“王后”“火星”）、 $v+x$ 类（如“蛀虫”“跑表”）、 $a+x$ 类（如“陈醋”“谬种”）、逆序类（如“下江”“钩吻”），状中格可再分为 $n+v$ 类（如“水遁”“鼻饲”）、 v_1+v_2 类（如“点射”“晒纳”）、 $a+v$ 类（如“长眠”“干洗”）、 $adv+v$ 类（如“休想”

“不符”)、逆序类(如“冲洗”“折秤”)。第四步,根据语素本身的概念类属对30个二级类复合词进行三级分类,得出95个三级类,例如定中格 $n+x$ 类复合词就可进一步分为“领有者+所属者”(如“己任”“蛛网”)、“处所+事物/动物”(如“山猫”“庐剧”)、“人/动物/事物+处所”(如“使馆”“药铺”)、“形状+动物/事物”(如“板鸭”“剑眉”)、“动物/事物+形状”(如“鸡冠”“屋脊”)、“动物/事物+工具”(如“鸟枪”“球拍”)、“工具+事物”(如“棒球”“水磨”)、“质料+事物”(如“柳罐”“钢筋”)、“原因+事物”(如“褥疮”“药疹”)、“事务+人/动物”(如“更夫”“衣鱼”)、“事物+拥有者”(如“财主”“病夫”)、“小类名+大类名”(如“羔羊”“鲸鱼”)、“方面+人/事物/行为”(如“师兄”“命案”)、“人/事物+方面”(如“父系”“骨科”)、“日的+事物”(如“寿面”“火险”)、“部分+事物”(如“股匪”“支渠”)、“时间+事物”(如“班机”“冬笋”)、“事物+时间”(如“霜期”“斋月”)、“事物+方位”(如“骰中”“史前”)、“方位+事物”(如“东欧”“中策”)、“时间+方位”(如“月底”“日前”)、“方位+时间”(如“前日”“中旬”)、“方位₁+方位₂”(如“中东”“上上”)、“数量+事物”(如“五岳”“群芳”)、“事物+量度”(如“温度”“数额”)、“名号+事物”(如“火星”“淮河”)、“颜色+事物”(如“墨菊”“彩带”)、“动物/事物+颜色”(如“鱼白”“铜绿”)、“规定+单位”(如“公斤”“市丝”)。第五步,根据A、B两个语素的表义特点而对95类复合词中的一些进行四级分类,得出121个四级类,如“领有者+所属者”类就可进一步分出7个小类:第1小类,“A表示人,B表示A领有的人或事物现象”(如“自身”“己任”);第2小类,“A表示人,B表示属于A的亲属”(如“弟妇”“姑丈”);第3

小类,“A表示人或其它动物,B表示A造成或具有的事物现象”(如“人祸”“蛛网”);第4小类,“A表示人或其它动物,B表示A体上具有的器官”(如“人心”“熊掌”);第5小类,“A表示事物,B表示由A造成的事物现象”(如“彘影”“水灾”);第6小类,“A表示物体,B表示提取自A的物质”(如“桐油”“骨胶”);第7小类,“A表示物体,B表示A上的某种物质”(如“花蕊”“车把”)。[17]周荐的这一研究所分析的材料虽然只是双音节复合词,但是由于三音节和三音节以上的复合词的结构方式是在双音节词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所以弄清了双音节复合词的结构方式,实际上就是弄清了全部复合词的结构方式。这一研究,对于指导人们更正确地用词、造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

上面所介绍的是词的结构的研究情况。对词的意义的研究,近20年来也取得了一些进展,这其中研究得较为深入的,对汉语词汇学的丰富起到了较大推动作用的,一是词的语素义,二是表达色彩。

对词的语素义进行的研究,是八十年代才开始的,从事这一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北京大学的符淮青教授。符淮青在1983年和1985年先后发表了关于语素“红”和语素“打”的论文[18],对语素“红”的构词能力和语素“打”在构词中意义模糊、消失的现象进行了分析。符淮青的研究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不囿于现代汉语的范围,而把视野扩展到汉语方言和古代汉语,把普通话和方言、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比较着进行研究。他在对表示人头部的词群和表示人眼睛活动的词群进行分析时就是这样做的。[19]这样的研究能发现只把目光集中在普通话

这种共同语上、只在现代汉语这一平面上进行研究所不易发现的问题，从而使研究得以深化。

比较而言，对表达色彩的研究要热烈得多。表达色彩中的一些问题，早在六十年代即已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20]，只不过那时仅止是提出问题，未及就所提出的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讨。近20年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涉及到表达色彩的各个方面，先后研究的色彩有形象色彩[21]、感情色彩[22]、语体风格色彩[23]、时代色彩[24]、地域（外来）色彩[25]等多种。对色彩问题研究的深入，并不表现在所分出的色彩的类别的众多上，而表现在对表达色彩中的一些理论问题的研究的深化和所得出的研究成果的丰硕上。比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学者们没有把精力集中到对表达色彩形式特征的分析挖掘上，而流于主观臆断，因此在一些词是有还是无表达色彩、如果有的话究竟是有哪一种这样一些问题上就存在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有鉴于此，周荐对表达色彩的显映方式作了研究，认为表达色彩的显映方式有三种，即白显式、对显式、从显式。周荐指出：“所谓白显式，是说一些词语其表达色彩的显映不是依凭着同其它词语的表达色彩的比照，而完全靠自身的形式特点来实现。”如“英豪”“霸柜”这类词凭靠自身的形式特点显现出所带的表达色彩。“所谓对显式，是说一些有表达色彩的词语依赖同其他有表达色彩的词语或无表达色彩的词语的比照而使其本有的色彩得以加强。”如“絮叨”与“罗嗦”各自所带的语体表达色彩靠这两个词与相应的有书面语语体表达色彩的词的对照而显现出来。“所谓从显式，是说一些词语其表达色彩的显映既不是靠自身的形式特点也不是凭借同其它有或无表达色彩的词语的比照，而是在词与词的固定搭配组合中受与之搭配组合的词所具的表达色彩的感染而实现的。”如“肉眼”的贬损的感情色彩靠其与“凡夫”“凡胎”“愚眉”等词

的固定搭配而显现出来。[26]这样的研究当然比只凭语感来判断哪些词有表达色彩哪些词没有表达色彩、哪个词有这种表达色彩而没有那种表达色彩，要科学得多，有价值得多。

四

近 20 年来，对词汇中词这种单位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词汇中大于词面和词有着相当的功能的那些熟语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一进步主要表现在对熟语的分类的研究上。

汉语熟语向有成语、谚语、歇后语等的分别，在分类上也向无大的争议。但是自从 20 世纪学界又造出“惯用语”这么一个术语之后，过去的那种宁静的状态似乎就被打破了。问题出在哪些单位可以称作成语，哪些单位可以称作惯用语上，或者说，成语指的是哪类单位惯用语指的是哪类单位上。大部分学者倾向于根据构成熟语的字数而将其区别开来，四字格遂被视为成语所有的格式，三字格也即被目为惯用语特有的格式；少部分学者主张根据有无字面掩盖下的比喻的深层义而分别开成语和惯用语，有比喻义者为成语，无比喻义者为惯用语。上述两派的意见是针锋相对的，因为照前者的意见，只要是由四个字构成的，不论它有无比喻义，就都是成语；而照后者的意见，只要有比喻义的，不论它是四字格还是三字格或其他格式就都是成语，只要是无比喻义的，不论它是三字格还是四字格或其他格式就都是惯用语。其实，按上述两派当中任何一派的意见，都无法将成语与惯用语严格地区分开来。单从形式上看，成语诚然多为四字格，但并不意味着凡四字格皆为成语，有不少非常俗白的口语化的单位，形式上也取的是四字格，但却在语感上与人们一般认可的成语相去甚远，如“哪说哪了”“一

米二去”“清汤寡水”“骑马找马”；单从表意上看，固然可以根据其意义是并非能够从字面上理解的比喻义而把“穿小鞋”“碰钉子”跟“黔驴技穷”“狼奔豕突”一起收归成语，但是，一者通常被人们认作成语的一些单位就会因为不具比喻义而被排斥出成语的行列，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磨刀霍霍”“唯命是从”，二者一些单位究竟有无比喻的那种深层义，或者有的是否比喻的那种深层义，都非易于定夺之事。有鉴于此，周荐在1994年提出了“经典性”一说，认为“所谓经典性，是说某个熟语单位出自权威性的著作，由于该熟语所从出的著作具有权威性，熟语本身也具有了一种权威性。有些熟语源出于权威性著作，有些熟语不源出于权威性著作而出自普通的作品或干脆就是一种口头创作，由此显示出两者的区别：前者古朴、凝重，具有经典性，后者通俗、直白，不具经典性。”[27]周荐在同文中还进一步指出成语这种熟语是有经典性的，成语之外的别类熟语则不具经典性。[28]嗣后，周荐又对成语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析，并且将成语和与之相近易混的单位进行了研究，结论是，成语“从意义内容上看，与俗语判然有别——成语的语素多是古朴、典雅的；从结构形式上看，也与俗语迥然有异——成语的形式多为四字格。成语内容和形式上的特点构成了成语区别于俗语的特殊性质——经典性。”[29]在未判断出或无法判断出一个四字格的形式、三字格的形式是否成语、惯用语的情况下，可径称之为四字语、三字语，以便于研究的展开和深入。[30]

附注：

[1][5][23]刘叔新(1990)《汉语描写词汇学》，商务印书馆，北京。

[2]如孙启孟(1936)《词和句》，开明书店，上海；张世禄(1947)

《语言变化与“同义异词”的现象》，《学识》第2卷第1期，南

京。

[3][4]刘叔新(1964)《论词汇体系问题》，《中国语文》第3期，北京。

[6]见周荐(1991)《同义词语的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刘叔新、周荐(1992)《同义词语和反义词语》，商务印书馆，北京；周荐(1994)《词语的意义和结构》，天津古籍出版社。

[7]其实，如果我们把目光不只放在同义词语上而把眼光进一步扩大开来，就会看到指称同一事物对象的不同词语的复杂情况，参看周荐(1997)《异名同实词语研究》，《中国语文》第4期，北京。

[8]如马建忠(1898)《文通》。

[9]见吕叔湘(1942)《中国文法要略》，王力(1943-1944)《中国现代语法》，高名凯(1948)《汉语语法论》。

[10]见张寿康(1957)《略论汉语构词法》，《中国语文》第6期，北京。

[11]见黎锦熙(1923)《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国语句刊》第七期，上海；崔复襄(1957)《现代汉语构词法例解》，山东人民出版社，济南。

[12]丁全(1987)《也谈词的构成》，《南都学刊》第3期。

[13]戴昭铭(1988)《现代汉语合成词的内部结构与外部功能的关系》，《语文研究》第4期，太原。

[14]刘叔新(1990)《复合词结构的词汇属性——兼论语法学、词汇学同构词法的关系》，《中国语文》第4期，北京。

[15]周荐(1988)《复合词词素间的意义结构关系》，南开大学铅印本，天津；后又收入《语言研究论丛》第六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和《词语的意义和结构》（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

[16]周荐(1995)《复合词构成的语素选择》，《中国语言学报》第七辑，语文出版社，北京。

[17]上述分类见周荐(1988)《复合词词素间的意义结构关系》和

周荐(1992)《几种特殊结构类型的复合词》，《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北京。

[18]符淮青(1983)《语素“红”结合能力分析》，《语文研究》第2期，太原；符淮青(1985)《“打”义分析》，《词典和词典编纂的学问》，上海辞书出版社。

[19]符淮青(1996)《词义的分析 and 描写》，语文出版社，北京。

[20]高名凯、石安石(1963)《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北京。

[21]见刘叔新(1980)《词语的形象色彩及其功能》，《中国语文》第2期，北京；周荐(1992)《也谈词语的形象色彩问题》，《南开学报》第5期，天津。

[22]见徐志民(1980)《关于词的感情色彩的几个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北京；周荐(1985)《试论词的感情色彩及其构成方式》，《天津社会科学》第3期。

[24]见周荐(1995)《论词语的时代色彩》，《汉语言文化研究》第五辑，天津人民出版社。

[25]见武占坤(1983)《词汇》，上海教育出版社；周荐(1993)《词的表达色彩的性质和类别》，《天津社会科学》第6期。

[26]周荐(1995)《词语表达色彩的性质和显映方式》，《词汇学新研究——首届全国现代汉语词汇学术讨论会选集》，语文出版社，北京。

[27][28]周荐(1994)《熟语的经典性和非经典性》，《语文研究》第3期，太原。

[29]周荐(1997)《论成语的经典性》，《南开学报》第2期，天津。

[30]周荐(1997)《论四字语和三字语》，《语文研究》第4期，太原。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